

西方學前教育思潮 在中國大陸的實踐和反思

朱家雄

華東師範大學學前與特殊教育學院

文章回顧了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三次幼稚園課程變革，闡述了西方學前教育思潮對變革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在反思西方思潮對變革的影響時，文章提出了要對價值無涉與價值有涉、宏大理論與地域知識、教育品質和教育公平以及學術研究與實踐研究等問題進行深入思考，並指出要在縱觀課程變革的歷史和經驗，橫觀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發展的基礎上把握幼稚園課程變革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西方學前教育思潮、中國幼稚園課程改革、反思

在中國大陸學前教育的發展歷程中，以幼稚園課程變革為軸心展開的改革主要有三次，分別發生在 1920 至 30 年代、50 年代以及 80 年代至今。西方學前教育思潮對這三次幼稚園課程變革，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西方學前教育思潮對幼稚園課程變革的影響

一、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幼稚園課程變革

上世紀初，中國大陸的學前教育主要照搬外國的模式，從教育內容、方法，到設施設備，先效法日本，後仿效西方。福祿貝爾、蒙台梭利和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和主張相繼對當時的幼稚園課程產生影響。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政治民主和科學進步，西方各種哲學流派開始在大陸廣泛傳播。對近、現代教育產生過深刻影響的首推杜威。陳鶴琴、陶行知、張雪門等教育家洞察了當時幼稚教育照搬外國所帶來的弊病和舊課程的混亂局面，接受並引進了來自西方，特別是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提出了從課程改革入手，使幼稚教育科學化、本土化的主張。

對幼稚園課程變革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是 1932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了《幼稚園課程標準》，這是中國幼稚教育發展史上第一個幼稚園課程標準。該標準規定了幼稚園的課程內容，指出課程不按學科分類，學科服從活動的主題，即以活動主題為中心組織課程。

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曾用法令的方式將該標準推廣到全國，要求各地遵照執行。但是「其思想與理念沒有能夠在遼闊的中國得以大規模實行。即使在當時的一些地方如江、浙、上海、江西一帶實施，效果也不是很好，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王春燕，2003，頁 44）。特別是要全部幼稚園的課程都以單元教學的形式展開，以大自然大社會的活動為中心來擬訂，依據不同的時令、季節、社會的活動和自然的現象，制訂出每個單元的中心，並圍繞著這個中心開展各項活動，這樣的課程指向和要求，產生了諸多與當時的幼稚教育實踐不一致的問題（宋恩榮，1994；周淑鐘，1952）。

第一次幼稚園課程變革，在探索科學化、中國化的學前教育實踐的道路上作出了貢獻，在理論上確認兒童的主體性；認定課程應源於兒童的生活和經驗；課程內容應以自然和社會為中心；提出了課程的編制應是整體、相互聯繫的，而不是割裂的。可以說，第三次幼稚園課程變革，

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這次變革的影響。然而，這次課程變革的實踐表明，教育理論的「先進」和「科學」並不等於教育實踐的有效，幼稚園課程變革的成功與否，更多地取決於複雜生態環境中的宏觀因素，而不是包括幼稚園課程在內的微觀因素。

二、五十年代的幼稚園課程變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大陸處於一個特殊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時期。當時的中國大陸，在包括教育在內的各個領域都選擇了「以俄為師」的路徑，幼稚教育也全盤接受前蘇聯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五十年代初，教育部邀請了前蘇聯的幼稚教育專家前來中國大陸講學，並推廣前蘇聯的幼稚教育經驗，主要引進了「作業」，教學大綱為作業規定了內容和時間，通過作業對幼兒進行系統的教學。自 1951 年起，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發起了幼稚園課程的變革，教育部統一制定了《幼稚園暫行規程》（草案）和《幼稚園暫行教學綱要》（草案），奠定建國初期幼稚園課程變革的基礎，規定了幼稚園教養活動的科目以及各科目的教育綱要，強調科目本身的科學性和邏輯性，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提出有目的有計劃地組織幼兒活動。

在五十年代，幼稚園課程的變革還體現在對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和兒童中心主義的批判，以及對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和陳鶴琴「活教育」理論的批判。以「活教育」理論為基礎的單元課程，被認為是「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學說，以兒童為本位，一味強調兒童興趣，把兒童看成自然物，順其自然去發展，培養個人自由主義」（張逸園，1952），在價值觀上是與新民主主義教育¹相悖逆的。政府以法令的形式廢除了單元課程。

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幼稚園課程變革十分平穩和順利，究其原因，應歸結於中國文化和當時的政治能接受分科形式的教育，也應歸結於在高度計劃經濟的狀態下，政府能通過行政途徑有效地層層下達。

五十年代的幼稚園課程變革逐漸形成的幼稚園學科課程體系，其教育目標明確，教育、教學內容有系統，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容易操作。這

種注重結果，容易操作的學科課程體系迎合了當時的需要；在教育資源缺乏、師資力量不足、師生比例較小的情況下，這種課程對提高幼稚教育品質起了一定的作用。八十年代初期，教育部頒佈了《學前教育綱要（試行草案）》，繼續採用學科課程體系，對於當時解決文革十年動亂所帶來的破壞，恢復正常的教育秩序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顯然，五十年代的幼稚園課程變革是得失兼有的。例如，以教師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以課堂為中心的幼稚園課程，將兒童看成是被動的「容體」；劃一的集體教育忽略了兒童之間存在的個體差異，以及兒童的個性和創造性的發展等等，這些問題，迄今為止還會由於慣性，對學前教育產生負面的影響。

從五十年代起，逐漸形成和發展的幼稚園學科課程對幼稚園課程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八十年代以來，幼稚園課程變革針對的是學科課程體系，儘管幼稚教育工作者對學科課程的弊端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是迄今為止，在學前教育實踐中，這種運行了數十年的學科課程仍有很大的影響力。

三、自八十年代起的幼稚園課程變革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幼稚園課程變革是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變革以及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背景下發生的，是在國際、國內對兒童發展和權力給與優先關注的潮流中發動的，是在對教育價值的重新認定以及對當時幼稚園課程不能與時並進的反思中提出的。當時，西方各種兒童發展理論和教育理論，諸如蒙台梭利、杜威、布朗芬勃倫納、布魯納，特別是皮亞傑等人的理論和思想在大陸廣泛傳播；近、現代教育家的思想，特別是陳鶴琴的教育思想再次受到重視，這些都為幼稚園課程變革提供了理論背景。

這場幼稚園課程變革，是從「民間」自發進行的試驗開始的，這些試驗從單科擴展到了整體，從城市擴展到了農村，對幼稚園課程變革起了推動作用。在這些試驗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南京師範大學趙寄石教授指導的「幼稚園綜合主題教育」的課程改革實驗、上海長寧區的「幼稚

園綜合性主題教育的實驗」、北京綜合教育實驗組的「幼稚園綜合教育初探」等等。可以說，這些試驗所針對的問題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幼稚園學科課程過分強調系統的單科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忽視各學科間的內在聯繫，忽視兒童自身的活動和直接經驗。

在 1989 年，原國家教委（現教育部）頒佈了《幼稚園工作規程（試行）》（簡稱《規程》，下同），自此，由民間發起的幼稚園課程的變革轉化成了由國家行政力量主導和推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規程》體現了這場課程變革的初衷，並通過行政途徑，將其所規定的內容推向各級行政職能部門和基層幼稚園。《規程》以當時在學前教育實踐中普遍存在的「三中心」（教師、教材和課堂）的狀況為矢，要求幼稚教育工作者實現「從單純知識灌輸、技能訓練，到培養能力，發展智力，進而研究幼兒各方面的協調發展；從注重考慮教師如何教，到研究幼兒在教育過程中如何從被動受教育，轉變為主動發展」的轉變（陳巧蘭、朱慕菊，1990）。

《規程》的變革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強調幼兒的主動活動，為幼兒提供充分活動的機會；（2）注重教育要適合幼兒的個體差異，促進每個幼兒在不同水準上的發展；（3）指出遊戲是幼稚園的基本活動；（4）強調寓教育於幼稚園一日活動之中；（5）強調幼稚園活動的過程。

為了推進幼稚園課程變革，原國家教委在全國各地建立了 10 個試行《規程》的試點園，例如北京市第五幼稚園、上海市烏南幼稚園、天津市河西區第一幼稚園、重慶市渝中區實驗幼稚園等等。這些試行《規程》的示範性幼稚園被要求在幼稚園實踐層面上落實《規程》提出的變革精神。在這些幼稚園中，「所宣導的『活動區活動』這種『新型的』教學組織形態實際上正是西方幼稚園傳統的活動課程。這 10 個示範幼稚園的實驗，為其後借助於教育行政力量推向全國的大規模學前教育改革運動提供了『看得見』的範本」（劉焱，2007）。

2001 年教育部頒佈了《學前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簡稱「新《綱要》」），細化和深化了《規程》。「新《綱要》」再次強調了學前教育要以幼兒發展為本，要尊重幼兒的人格和權利，要尊重幼兒身心

發展的規律和學習特點，要以遊戲為基本活動，要保教並重，要關注個別差異，促進每個幼兒富有個性的發展；認定幼兒的學習與發展是一個主動建構的過程，學前教育應注重幼兒自主性的發揮與發展，幼稚園課程要為幼兒提供整合的、情景化、生活化的經驗。

這場曠日持久的課程變革迄今已歷時 20 多年了，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動用的資源之多，是歷次幼稚園課程變革所不可比擬的。在國家改革開放的政策下，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全面實施改革，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對由國家行政主導和推行的教育改革的評價，包括對幼稚園課程變革的評價，自然是比較正面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間的流逝，隨著學前教育實踐中各種問題的產生，也能聽到越來越多的抱怨、批評和質疑之聲。人們開始從其他立場和視角審視和評價這場幼稚園課程變革。

對西方學前教育思潮在中國大陸學前教育影響的反思

在反思中國大陸三次幼稚園課程變革的歷程，特別在反思迄今仍在進行的第三次變革時，對西方學前教育思潮在中國大陸學前教育的正負面影響的反思是十分重要的。

一、當今幼稚園課程變革的主要問題

如果說中國大陸第三次幼稚園課程變革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只能說主要是在教育理念的層面上衝擊了 80 年代以前不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幼稚園課程，改變了學前教育工作者頭腦中的一些陳舊觀念。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通過變革解決中國大陸學前教育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幼稚教育課程改革的歷程簡直就是一個美國幼稚教育課程模式『你方唱罷我登台』的熱鬧場面」。課程

改革「以西方各種先進理論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是缺乏自己的理論基礎，致使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的現象」（李敏誼，2006，頁2）。有人認為，近20年中國幼教改革內在的主要問題有：（1）是一種由上至下的改革，教育決策與教育實踐脫節；（2）是一種教育理念的改革，教育理念與教學實踐改革脫節；（3）是一種理想化的改革，教改與現實情況脫節，與現實條件並不配套，例如師生比例、師資培訓等。「雖然從客觀上已經確立了……一切以兒童發展為本的主流教育思想，但在教學實踐上還未能做得到，形成了具中國特色的『理念與實踐相脫節』的問題」（Liu & Feng, 2005）。

其實，教育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只是幼稚園課程變革呈現的表面問題，其根本性的問題關乎課程的文化、社會和政治適宜性，以及價值取向等。

二、反思幼稚園課程變革的幾個基本問題

在對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變革進行反思時，會涉及對以下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

1. 價值無涉 vs. 價值有涉

幼稚園課程變革不可對社會和文化缺乏敏感性，因為任何變革都是與變革者的價值取向相一致的。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西方的各種兒童發展和教育理論開始廣泛傳播，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幼稚園課程變革。這場變革的主旨是從強調教育結果轉化為強調教育過程，從強調教師的教學轉化為強調兒童的發展；在課程管理上，從注重課程的標準化和統一性轉化為注重課程的多元化和自主性等方面。「以兒童發展為本」成了這場變革的綱領和行動指南。

近些年來，這類以兒童發展理論為依據的課程已經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斯波代克認為，課程應該超越兒童發展，因為人們的文化價值觀決定了什麼才是兒童應該知道的和教師應該教的（朱家雄，2007）。主張重新構想學前教育的學者們則指出，這些課程過多地依賴心理學理

論，過分強調兒童發展，而對社會和文化缺乏敏感性，鼓勵人們去發展一種以標準化為基礎、充斥著評價的、價值無涉的幼稚教育實踐（岡尼拉·達爾伯格等，2006，頁 111）。

幼稚園課程變革固然帶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變革者不能始終堅持以「理想化」狀態為標準和示範，強行以此去規範和改造「不理想」狀態的幼稚園課程。如若這種「理想化」狀態是以西方人的價值觀為基礎的，那麼這種規範本身就具有「殖民主義」傾向。

李輝（2007）以激烈的態度批評，「整場改革運動誤用了文化普遍化的邏輯，誤以為美國幼教就是最理想的文化存在，向其學習則是中國幼教發展的歷史必然」。他指出，這種主觀上割裂文化傳統、客觀上奉迎文化霸權的改革最終必會出現課程變革與教育實踐相脫節的問題。

其實，在不同的文化中，課程變革者一直在追求的理念如「個性」、「創造」、「主動」、「自主」、「探索」等，都不是中性，完全客觀和與價值無涉的概念，脫離了文化背景，這些所謂的「先進理念」只是「烏托邦」。

在課程變革中，諸如 High/Scope 課程、方案教學、光譜方案、瑞吉歐學前教育實踐等都為中國大陸幼稚園教師所熟悉，有的也被部分幼稚園借鑒。西方學前教育課程的介紹和引進，曾對豐富中國大陸學前教育課程的理論和實踐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變革的出路就是運用這些課程，或是將這些課程本土化。應該看出，這些課程都是在西方特殊文化背景中產生和發展的，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著相當的距離。

誠如約瑟夫·托賓（2007）所言，「無疑，許多美國的學前教育工作者很高興在中國的幼稚園中推廣建構主義、活動區角、自我表達、方案教學。但是作為一個教育人類學者，我擔心這些教學法將如何融入到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之中，以及在貫徹這些方法時，如何考慮中國社會本土的實際情況」。

而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學前教育問題已經成為了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熱門話題，這是人們對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普適性的、價值無

涉的幼稚園課程進行反思的結果。學前教育理論和實踐的這種發展趨勢，為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未來的變革和發展方向提供了背景。

2. 宏大理論 vs. 地域性知識

在西方學前教育思潮影響下，中國大陸的一些理論工作者持續地接受著現代歐美話語系統的影響，通過各方的努力，已經構建了所謂「正確兒童觀」、「正確教育觀」和「正確課程觀」的宏大理論，並要求通過實踐，將理論轉化成為教師在日常教育、教學中的行為。

持這種觀點者認定存在普遍意義上的兒童、學前教育和幼稚園課程，要求遵從「科學的」兒童發展規律以及按照「正確的」理念去培養兒童。例如，建構主義理論、社會建構理論、多元智慧理論等一些源於西方的理論，被認定是有代表性的、「先進的」理念。

很顯然，在引進這些理論時，大多沒有關注來自不同文化、種族和語言背景的兒童生活經驗和知識結構的差異。其實，這並不是理論本身的問題，而是將這些理論運用於幼稚園課程而產生的問題。將這些主要來源於以西方白人中產階層兒童為研究對象的結論加之於不同背景的兒童身上，這種做法一定會產生與教育實踐不相適合的問題。

儘管在學前教育領域中不乏關注文化研究、女權主義理論、批判視角、後現代主義與結構理論的學者，但是相比較教育的其他領域，此領域的主流似乎仍然是關注個體，關注標準化的兒童發展。針對這種狀況，一些學者對於宏大理論能適用於所有兒童，而無須考慮文化、語言、信仰和生活環境的差異的觀點提出挑戰。例如，岡尼拉·達爾伯格等（2006，頁 13）曾說：「理論是一把雙刃劍，不但能阻礙教育實踐活動的變革，也能作為促進變革的工具。」

從生態學的視野出發，在思考幼稚教育的問題時，基本的出發點並非只是所謂「公認」的或「宣導」的宏大理論，而是在背景中的幼稚教育實踐。從構建宏大理論到地域性知識，這樣做並非看低甚或否定理論的作用，而是對幼稚教育重新構想的過程，為的是在實現教育理想的同時，也能充分考慮到教育實際狀況；為的是在走向全球化、資訊化的同時，也能保持文化和知識的多元性和地域性。

3. 教育品質 vs. 教育公平

在「教育品質」之外，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概念即「教育公平」。如何實現「教育品質」和「教育公平」兼而有之，一直被提倡作為教育的基本價值訴求，因而也歷來是教育變革與發展的重要議題。在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優先考慮教育品質還是教育公平，往往會成為顧此失彼的兩難選擇。

在世界範圍內，存在著關於學前教育品質的主流話語，其所討論的常是如何評估學前教育品質以及如何保證品質等問題。以「技術理性」為基礎的對學前教育品質的思考和做法，在西方學前教育學術界中往往佔有統治地位，許多關於品質的研究者是發展心理學家，他們採用了高度實證性的、去背景化的以及普遍性的方式為品質研究提供了成果。

借鑒西方國家關於學前教育品質的想法和做法，對於中國大陸的幼稚園課程變革既有積極，也有消極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說，這能滿足部分公民對高水準幼稚教育的需求，能提供便於操作的評估和監管系統等。從消極的方面說，這有可能使我們丟失自己的文化價值取向，使我們不顧國情，盲目追求高標準等。例如，為了推行高品質學前教育，有限的教育資源會被投入「優質」教育機構和課程中，並希冀通過這些機構向全社會推廣，以此帶動幼稚教育整體品質的提高。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因教育資源配置不公而產生的問題。

當今，中國大陸正在大力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努力消除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擴大、公共教育資源分佈不均衡、分配不公等的一些不和諧的社會因素。在這樣的背景下，思考「為處於劣勢社會經濟地位的幼兒提供公平的受學前教育的機會」這樣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4. 學術研究 vs. 實踐研究

學術研究關注的是理論，理論只是一種假設，許多理論從來就沒有被證實過，而且始終是在被修正的過程中。學術研究者會有自己相信和偏好的理論，並由此決定了該學者看問題和解釋問題的視角。

例如，一些學者對建構主義、多元智慧、後現代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理論的偏好本是合乎情理的，學者介紹和解釋這些理論也是他們的本份，而這些理論多少也能給與幼稚園課程編制、實施和變革起到一定的啓示和指導作用。但是，認定這些東西就是先進的，在實踐中是必須去遵循和實施的，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曾任美國教育界多項要職的歷史學家艾倫·拉芪曼（Lagemann, 2000）曾指出，美國教育研究的百多年歷史是一段捕風捉影的歷史，大部分教育領域的研究，對教育本身沒有幫助，因為「主要的教育研究的驅動力把教育研究推向一些不良的方向，拋開現實生活中政策和實踐之間的緊密互動關係，一味追求過分量化分析和科學主義」。事實上，幼稚園課程變革應著眼於解決教育實踐中的問題，其固然存在理念層面上的更新，但並不應著眼於驗證理論是否正確。

三、對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變革反思的結論

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變革走過了數十年的路徑，幾經波折，幾經滄桑。大凡一場變革的高潮過後，就會逐漸回歸理性，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幼稚園課程變革同樣如此。

中國大陸第三次幼稚園課程變革已經歷了 20 多年，在此漫長、尚在進行的過程中，得失兼有。而今，在反思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變革中，應該看到運用科學主義這把雙刃劍「指揮」幼稚園課程變革所帶來的利弊；應該思考如何將幼稚園課程變革置於生態背景中去考慮，即一切從教育實際出發，從解決實際問題出發，而不是從某些理論或理念出發；應該在縱觀幼稚園課程變革的歷史和經驗，橫觀中國大陸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發展狀況以及國際幼稚教育的發展狀況的基礎上，把握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變革的趨勢和發展方向。

在當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政方略下，從文化建設和文化安全等視角出發，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變革在吸取外來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的同時，應更多關注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的問題。關注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並不排斥來自其他文化中的

有益於中國大陸幼稚園課程建設的成分，文化的交流，文化間的相互碰撞和接納才會有益於文化的發展，但是，在課程的編制和實施中，佔主流的應是中華優秀文化以及能反映其根本價值的東西。

中國大陸正在大力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消除中國大陸社會目前所存在的一些不和諧因素。在宣導教育公平的原則下，中國大陸的幼稚園課程變革應將「天平」更多地傾向於「弱勢群體」，更多地關注缺少幼稚教育機會的幼兒及其家庭。

幼稚園課程的變革，為的是適應社會變革的需求，變革往往會是矯枉過正的，往往會因為過分強調需要變革的方面，而忽略平衡地思考和處理問題。待到課程變革開始出現了問題，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就會從「二元對立」的模式逐漸走向妥協和平衡。具體地說，當人們在享受幼稚園課程變革的成果所帶來的歡樂時，也開始品嚐由此帶來的問題和煩惱，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會改變「非此即彼」的模式，而採用「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在兒童本位與社會本位、兒童經驗與知識邏輯、兒童主體與教師主導以及過程導向與目標導向之間進行協調和妥協，進行相容和平衡。當然，幼稚園課程走向平衡化不是沒有原則和標準的，其原則和標準就是幼稚園課程實施的有效性，即既有益於幼兒的發展，又有益於有效地將幼兒的發展納入社會需要的軌道。

註釋

1. 新民主主義教育指的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教育。毛澤東提及「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教育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而形成，其發展過程可分為五個時期：（1）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大革命時期，（2）土地革命時期，（3）抗日戰爭時期，（4）解放戰爭時期，（5）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參考文獻

- 王春燕（2003）。《中國學前課程百年發展、變革的歷史與思考》。未出版博士論文，南京師範大學。
- 朱家雄（2007）。《從一位國際著名學前教育專家的反思說起》。《幼稚教育》，第1期，頁4。
- 宋恩榮（主編）（1994）。《近代中國教育改革》（頁204）。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 李敏誼（2006）。《美國幼稚教育課程模式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北京師範大學。
- 李輝（2007）。〈普遍論抑或相對論：中國幼教改革之文化學反思〉。《中國視野下的學前教育》（頁57）。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周淑鐘（1952）。〈從南京鼓樓幼稚園工作中檢討我自己〉。《人民教育》，第2期，頁22。
- 岡尼拉·達爾伯格等著，朱家雄等譯校（2006）。《超越早期教育保育品質：後現代視角》。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約瑟夫·托賓（2007）。《從民族志研究視角看學前教育的品質》。載朱家雄（主編），《中國視野下的學前教育》（頁142）。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巧蘭、朱慕菊（1990）。〈關於《幼稚園管理條理》和《幼稚園工作規程》（試行）中的幾個問題〉。《學前教育研究》，第2期，頁4-9。
- 張逸園（1952）。〈新中國幼稚教育的基本情況和方針任務〉。《人民教育》，第2期，頁15。
- 劉焱（2007）。〈大陸近二十年來學前教育改革的歷程回顧與現狀分析〉。載朱家雄（主編），《中國視野下的學前教育》（頁22-23）。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Lagemann, E. C. (2000). *An elusive science: The troubl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u, Y., & Feng, X. X. (2005). Kindergarten educational reform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mainland China: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 13(2), 93-99.

Implementa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Western Though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Jiaxiong ZHU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ree main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reform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explic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western thought in driving those reform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hen reflecting 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thought on the reform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following issues: value-free vs. value-related education, macro theories vs. local knowledge, quality education vs. equity in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vs. practical stud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discussion about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of Chines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reform should be based not only on an overview of curriculum reform history and experience, but also 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as a foundation for reform.

朱家雄，華東師範大學學前與特殊教育學院教授。

聯絡電郵：zhujx8@126.com